

中美经贸关系：发展与挑战

○潘 锐

内容提要 经贸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美两国经贸往来在双边关系中一直扮演一种积极的角色,起着促进两国关系发展的作用。良好的中美关系如果缺乏良好的经贸关系是不可想象的,但良好的经贸关系亦不能自动转化为良好的政治关系。本文考察中美经贸的发展与现状,分析双边经贸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就两国正常经贸关系的建立提出相应的见解。

关键词 中美关系 经贸关系 发展与挑战

作者简介 潘 锐,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上海美国学会秘书长。

中图分类号:F12,F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964[2003]12-031031-1026

经贸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美两国经贸往来在双边关系中一直扮演一种积极的角色,起着促进两国关系发展的作用。当然,经贸关系毕竟不是双边关系的全部,良好的中美关系如果缺乏良好的经贸关系是不可想象的,但良好的经贸关系亦不能自动转化为良好的政治关系。对中美经贸关系与两国关系进行辩证认识和分析,有助于我们给予双边经贸关系一个恰当的定位,既不夸大也不降低其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从而为我国的对外经贸和对美外交服务。

增长率既大大超过了世界贸易的年均增长率,亦远远超出中国外贸的年均增长率。20世纪90年代,双边贸易额继续保持持续增长势头。1997年中美贸易额为489.9亿美元,1998年为549.4亿美元,1999年为614.3亿美元,2000年增至744.7亿美元,2001年为769.7亿美元,2002年猛增至971.8亿美元。如根据美国公布的数字,则中美双边贸易额更高,1997年为754.2亿美元,1998年为854.1亿美元,1999年为949.0亿美元,2000年增至1162.1亿美元,2001年达1214.6亿美元。美国1979年即为中国的第3大贸易伙伴,1996年则跃升至第2位。中国1980年是美国的第24位贸易伙伴,1996年起跃升至第4位。

2.在华直接投资

自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外国资本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尽管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一直是提供对华贷款的重要机构,但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已成外资的主要来源。在外国直接投资中,美国资本发展迅速,截至2002年底,美国在华投资的项目数为37212个,协议投资额为762.53亿美元,实际投资额403.79亿美元。除香港、台湾地区之外,美国自1998年以来已成为对华直接投资最大的国家。美国在华投资范

中美两国经贸主要包括双边贸易、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和美国对华技术转让等方面。

1.双边贸易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后,两国签署了双边贸易协定,1980年起,两国又相互提供贸易最惠国待遇,从而为双边贸易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基础。根据中国海关统计,自1979-1989年的10年间,中国自美国进口和对美出口的年度增长率分别为15%和22%,这一

围、领域均很广泛,在 20 多个省、市和自治区中有投资,涉及的行业包括机械、石油、电子、通讯、化工、纺织、能源、轻工业、食品、农业、制药业、旅游、保险、房地产、汽车以及航空工业等。名列《财富》杂志前 500 名的美国公司中已有 300 余家在华投资,例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上海浦东投资 20 亿美元与中方合作生产汽车,“别克”系列汽车在中国汽车市场上所占份额正逐年上升。

3. 对华技术转让

在中美经贸关系中,对华技术转让一直由美国政府所掌控并受到政治因素的极大牵制。自朝鲜战争爆发至 1971 年,美国对华实施禁运政策。禁运取消后,对华出口受到严格限制,尤其是军用技术和军、民两用技术的出口限制更严。美国军需品出口管制清单(USML)、美国商务部出口控制清单(CCL)以及“巴统”协调机制便是美国对华技术产品出口的主要控制体制。根据上述机制的规定,不仅美国本身,连美国的盟国对华出口包含有美国制造的部件的两用技术产品亦受到禁止。美国在华企业,不论是独资还是合资,从美国进口两用技术、设备、零部件和原材料时,均需向美国政府申请许可证。根据美国《出口管制法》,世界各国均被划为不同的类别,中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被列入 Y 组,不准进口军用高技术产品。1980 年 4 月,中国独自被列为 P 组,允许自美进口某些两用技术产品。1983 年 5 月,为推动美国对华出口,里根政府把中国升至 V 组,根据修正了的《出口管制法》,对华高技术出口进一步放宽。1985 年 12 月,美国与“巴统”达成协议,简化 27 类技术和产品的对华出口,包括计算机、机床、机器人、软件、实验测试装备、半导体和通讯设备等。1992 年 10 月,中美双方达成《市场准入谅解备忘录》,美国同意放宽“6·4”后实施的对华高技术出口的限制。受上述各项影响,美国对华技术转让和产品出口有较大增长。1982 年,美国批准的对华技术出口许可证为 2020 项,价值 5 亿美元,1985 年则上升至 8637 项,价值 55 亿美元。1992 年,美国对华技术转让占中国技术引进的 22.7%,在项目数上亦超过了日本。目前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软件供应国。

但是,美国在对华技术转让中始终将其国家安全利益和对中国技术上的限制作为主要考量因素,从而使中国自美国引进技术遇到重重障碍,而且美国亦不是中国最大的技术引进国。美国对华出口管制表现为对中国的某些技术与商品出口审批时间过长,拒批项

目过多,商业卫星发射合作尚未恢复,频繁以中国向伊朗等第三国出口导弹及其相关技术为理由而制裁中国公司等等。正由于美国在技术转让和出口两用技术、高科技产品上对中国加以重重限制,该领域从而成为中美经贸关系中最薄弱的环节,从而不利于消除双边贸易不平衡现象。

中美两国贸易往来之所以能得到迅猛发展,其主要原因是:

首先,中美两国资源条件、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以及消费水平存在着较大差异,经济具有互补性。

从中国方面看,数百万工人从事对美出口的加工组装业,有利于中国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美国市场巨大,购买力强,消费层次不同,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服装、鞋、玩具以及电子产品的良好出口市场。美国在华投资的特点是规模大、技术含量高和管理先进,在中国引进的外资中占有重要地位,有利于中国产品的升级换代和出口竞争。从美国方面看,仅对华直接出口就为美国提供了 30 万个就业岗位,双边贸易至少为美国工业提供了上百万个工作岗位,且呈逐年增长之势。中国经济的发展对高技术和先进设备的需求极大,中国市场对美极具吸引力。美国在华大多数企业均已盈利。中国和美国已形成一种共识,即双边贸易的发展既有利于拓展双方市场亦有利于增强各自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能力。

其次,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吸引了美国的注意力,扩大在华市场份额、对华销售更多产品与服务已成为美国工商界努力不辍的目标。为达此目标,一方面美国不仅政府出面,通过谈判、对话以及施压等一系列手法,力图使中国打开市场大门,降低关税壁垒,过去的 10 多年见证了中美“301”的特别谈判、市场准入谈判、纺织品贸易谈判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全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美双边贸易额节节上升,双边经贸联系日益密切,双边经贸往来的氛围与条件也大为改善。特别是克林顿政府时期,经济发展被列为政府的首要目标。1994 年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1999 年中国与美国关于中国“入世”双边协议的达成以及 2000 年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均可视为美国政府推动中美双边经贸关系发展的积极举措。另一方面,美国企业出于占领中国市场,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和全球生产布局等全面考量,对华直接投资大幅度增长,美国成为在华投资额最高的国家,从而使中美双边经贸关系更为密切。

第三, 政治和战略利益是中美双方考量的因素, 美国方面尤为明显。美国的战略目标是防止在欧亚大陆出现与美国相抗衡的力量, 并把美国在西方的领导地位扩展到对全世界的领导。为此目的, 现阶段美国对华政策依然是全面接触而非遏制, 试图通过发展美中双边关系, 逐步将中国纳入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经济体制和国际安全体制。从这一基本目标出发, 在美国看来, 发展中美双边经贸关系将进一步密切双方的商业利益, 推动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国际化, 并促进中国国内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

二

进入新世纪以来, 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美国向中国提供永久性正常贸易待遇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困扰了中美经贸关系 10 多年的“最惠国待遇”问题之后, 双方经贸往来在原有基础上又有新的提升, 贸易额不断攀高, 相互依赖度持续加深, 中美经贸关系进入了一个持续发展的新阶段。然而, 随着中国经济继续以超过 8% 的速度增长, 对美出口节节上升; 而与此同时, 美国经济复苏乏力, 失业率持续走高, 美元对欧元一直疲软。在这种经济对比的环境中, 美国迎来了大选年, 单纯的经济问题于是被置于美国国内政治议题之中而变得不再单纯, 无论是民主党候选人还是布什总统本人都从选举政治出发来看待中美经贸问题, 从而使其泛政治化, 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一点也不亚于当年“最惠国待遇”问题的辩论, 对双边关系的挑战不容忽视。

中美双方目前在经贸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与面临的挑战包括: 已存在多年的贸易平衡问题、今年以来新出现的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问题以及美国如何

评估中国履行 WTO 协议的承诺等。

1. 贸易平衡问题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 贸易平衡问题即被美国视为中美双边经贸中的一个问题, 尤其在美方提出中国对美顺差仅次于日本名列第 2 位之后, 美国部分利益集团将此问题与美国国内就业等相关联, 从而使经济问题人为政治化。今年以来, 出于大选之政治需要, 美国又将此问题与人民币汇率相联系, 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事实并非如此。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在于:

首先, 根据中国方面统计, 1979-1992 年的 14 年中, 中方一直逆差, 1993 年方转为顺差。而按照美方统计, 1979-1982 年美国为顺差, 1983 年出现逆差, 比中方统计中出现的顺差整整早了 10 年, 而且美方逆差数额巨大。表一便显示了双方统计上存在的明显差异。

为了查清中美双方因统计上的原因所造成的差异究竟有多大, 1994 年在中美商贸联合委员会下成立了双边贸易统计小组, 进行专题研究。通过一年多的努力, 比较了中国、美国和香港 1992 年和 1993 年的贸易统计数据, 双方得出三点结论: (1) 美方的进口统计因忽视转口和转口增加而高估了从中国的进口。货物离开中国后在第三方增加的价值不应该计算为中国的出口。(2) 美方的出口统计因忽视转口而低估了对中国的出口。(3) 美国确定货物原产地所采用的方法, 导致双方统计上的差异。据此该小组认为, 仅因转口因素, 1992 年和 1993 年美国统计的对华贸易逆差平均便被高估 40%。

其次, 由于中国对外开放, 外国在华直接投资迅速增长, 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

表 1 中美双边贸易统计

单位: 亿美元

	中方统计			美方统计		
	中国出口	中国进口	中国平衡	美国出口	美国进口	美国平衡
1993	169.7	106.9	62.8	87.7	315.4	-227.7
1994	214.6	139.7	74.9	92.9	387.8	-294.9
1995	247.1	161.2	85.9	117.5	455.6	-338.1
1996	266.9	161.6	105.3	119.7	514.9	-395.2
1997	327.0	163.0	164.0	128.6	625.6	-497.0
1998	379.8	169.6	210.2	142.4	711.7	-569.3
1999	419.5	194.8	224.7	131.1	817.9	-686.8
2000	521.1	223.6	297.4	161.9	1000.2	-838.3

资料来源: 中国海关、美国商务部。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 12.58% 猛增至 1996 年的 40.72%, 2000 年更是高达 47.97%, 即近一半的中国出口是由外商企业创造的(见表 2); 而且, 相对于国有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增长速度甚为惊人, 目前仍保持着 2 倍于国有企业的出口增长速度(见表 3), 可以说, 外商投资企业已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增长点。显而易见, 外商投资企业由此所获的利润并非中国政府的收入, 中国方面所得到的仅仅是劳动力价格(劳务费), 而这部分通常只占产品价格的 10% 左右。

第三, 国际资本流动反映在贸易上的结果, 即为降低成本和提高竞争能力, 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在中国大力发展出口加工贸易, 从而使这些国家和地区与美国的贸易顺差大幅下降, 甚至成为逆差, 而中国对美贸易则大幅顺差。事实上, 根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 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

维持着大体上的平衡, 例如, 从 1987-1995 年, 美国对新加坡、韩国以及香港和台湾地区的贸易逆差从 340 亿美元减少到 78 亿美元, 同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却从 28 亿美元增加到 338 亿美元。而且, 包括美国跨国公司在内的全球跨国公司出于其整体企业战略需要, 在中国设立的工厂已成为其整体环节的一部分。跨国公司内部贸易, 关联交易对各国贸易平衡所带来的影响日益扩大, 而美国尚未将这一因素纳入中美贸易平衡的考量之中。

第四, 这也是美国对中国歧视性出口管制政策的必然结果, 尤其在高技术及其产品的出口上。20 世纪 80 年代, 美国曾逐步放宽对华出口管制, 但 90 年代以后, 美国出于政治需要, 对华出口管制却有所加强, 巴黎统筹委员会的解散亦未能改变美国的态度。美国迄今仍维持着对华制裁措施, 从而直接影响到美国产品的对华出口及参与出口竞争。

表 2 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出口总额中的比重

单位: 亿美元

年份	中国出口总额	外资企业出口额	所占比例%
1990	620.9	78.1	12.58
1991	718.4	120.5	14.18
1992	849.4	173.6	20.43
1993	917.4	252.4	27.51
1994	1210.1	347.1	28.68
1995	1487.8	468.8	31.51
1996	1510.5	615.1	40.72
1997	1827.9	749.0	40.98
1998	1837.1	809.6	44.07
1999	1949.3	886.3	45.47
2000	2492.0	1194.4	47.93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2001)、《中国统计年鉴》(2001)。外资投资企业包括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以及外商独资企业三类。

表 3 外资投资企业出口增长速度与国有企业出口增长速度比较 单位: 亿美元

年份	中国出口总额 (增长速度%)	外资企业出口额 (增长速度%)	国有企业出口额 (增长速度%)
1990	620.9 (18.2)	78.1 (59.1)	542.8 (14.0)
1991	719.1 (15.8)	120.5 (54.2)	597.0 (10.3)
1992	849.4 (18.1)	173.6 (44.1)	675.5 (13.1)
1993	917.4 (8.0)	252.4 (45.4)	652.6 (-3.3)
1994	1210.1 (31.9)	347.1 (37.6)	847.6 (29.9)
1995	1487.8 (23.0)	468.8 (35.1)	992.6 (16.8)
1996	1510.5 (1.5)	615.1 (31.1)	860.6 (-13.2)
1997	1827.9 (21.0)	749.0 (21.7)	1026.9 (19.3)
1998	1837.1 (0.5)	809.6 (8.0)	967.8 (-5.8)
1999	1949.3 (6.1)	886.3 (9.5)	984.9 (1.8)
2000	2492.1 (27.8)	1194.4 (34.8)	1164.5 (18.2)

资料来源:据《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2001)、《中国统计年鉴》(2001)相关资料计算, 括号中的数字为当年相对于前一年的增长速度。

2. 人民币汇率问题

汇率问题更多地从属于一国内部事务,人民币汇率之决定当然由中国政府依据国家总体经济形势和金融状况而决策,本与中美经贸扯不上什么关系,但美国布什政府出于国内政治特别是选举政治的考量,将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不平衡牵扯在一起,从而使之成为双边经贸关系中的一个新焦点。

日本是提出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始作俑者。早在去年,日本国内就有人提议要求人民币升值,荒唐地认为中国出口转嫁了通货紧缩,而人民币升值则可限制中国的出口,减缓日本的压力。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便是此论的倡议者和推行者。在去年西方八国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上,盐川提出议案,要求会议通过逼迫人民币升值的文件,但未能得逞。今年以来,盐川及其他日本财界人士又不断活动,四处兜售其提议。

美国适时接过日本的提议,并通过其政府高官的讲话使人民币汇率问题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和政治舞台上的一个热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和财政部长斯诺等人都公开表示,中国必须在适当时候对汇率管制做出调整。美国政府派遣财政部长斯诺于今年9月上旬访问中国,人民币汇率问题乃其中国之行的重要议题。或许感到姿态做得还不够,布什总统本人9月4日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CNBC)采访时表示,斯诺部长访华带去了美国政府的强烈要求,“希望我们的贸易伙伴能够对我们的生产者、工人和农民公平以待。但是,货币由政府操纵时,就不公平了。”布什总统的出面,使人民币汇率问题达到了一个高潮。更有甚者,美国参院第1586号提案要求中国解除人民币的固定联系汇率,否则将向中国对美出口商品加收27.5%的关税。众院亦酝酿相类似的提案。美国国会美中安全和经济评估委员会就此提交了《美中贸易对美国工人、工资和就业的冲击》的报告,进一步渲染了问题的严重性。

美国借人民币汇率问题大做文章,并使之有可能成为中美之间的贸易纠纷,其出发点并非经济意义上的,更多的是出于政治目的。

首先,布什政府提出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大背景是新一轮大选的展开。以全美制造商协会为首的制造业进行大力游说,要求布什政府采取措施振兴美国制造业、降低失业率。面对美国经济增长问题上乏善可陈,失业率居高不下的不利状况,而同时在对外政策和伊

拉克、阿富汗与朝鲜等主要问题上的窘境,布什政府不能不倾听国内制造业的呼声,既要设法为使经济增长找到良方,又要有为大量失业人口的存在和传统制造业每况日下承担责任的对象,于是,中国便成了一个很好的借口,人民币成了发泄不满的目标。客观而论,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逆差并不直接关联,与美国制造业衰落更是无甚干系。以美日贸易为例,自1985年“广场协议”以来,日元升值了近2倍,但美国对日贸易逆差依然逐年增长,日本连年保持对美最大贸易顺差国地位。美国与欧盟贸易中也存在欧元升值而美国逆差依旧的现象。这表明,即使人民币升值,并不能解决美国巨额贸易逆差问题,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源在美国经济本身,并不在他国身上。至于美国制造业,一方面,出于生存和竞争需要,数十年来一直进行投资转移,在发展中国家设厂,造成就业机会的转移,这完全是美国企业的自主决策,与被转移国并不相关,因此,中国根本无须承担任何责任。另一方面,这些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为其自身带来巨大利益。以在华投资为例,中国美国商会在其《2003年白皮书》中称,接受其调查的254家美国在华公司中,75%的公司实现赢利,10%的公司利润非常丰厚,而且,美国公司去年的在华利润率高于其在全世界的平均利润率,这必然促使美国企业进一步的投资转移。

其次,美国是从其自身经济利益而非双赢观点出发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因而具有浓厚的转嫁损失、阻止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意味,其意图路人皆知。今年以来,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率在1%-2%之间徘徊,而中国经济虽然遭遇“非典”影响,上半年依然增长了8.2%,在华外国直接投资同期大幅增长34.3%,达到303亿美元,因而在世界经济表现差强人意的状况下,中国经济依然呈现欣欣向荣迹象。对此,布什政府不少人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是实施人民币盯住美元政策的结果,人民币随着美元贬值而贬值,从而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而美国采取的美元贬值措施却由于人民币盯住美元而未能发挥美元贬值的积极效应,所以,2002年在美元贬值的情况下,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依然达1031亿美元,占美国外贸贸易逆差总额的1/4。暂且不说这一判断与事实相去甚远,它首先却表现了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功利性和实用性,以及只顾自身经济利益的狭隘性。人民币盯住美元实施已近10年,东亚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不仅有利于亚太地区金融稳定,而且也

受到美国称赞。目前,在中国逐渐履行“入世”承诺、开放国内市场以及逐步进行金融改革之关键时刻,人民币升值对中国而言意味着国际竞争力的减弱,外资流入的减缓,可能引发的金融不稳定以及经济增长率下降,换言之,中国经济有可能步 80 年代末日本经济衰退的后尘。对美国而言,从经济层面看人民币升值亦是有害无益的,这不仅会损及在华投资的美商,而且会伤害美国从事中美贸易的中间商与零售商,从而伤害美国消费者,因此,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是典型的损人不利己。当然,从战略与政治层面看,则结论又有所不同。

三

中美经贸关系虽然存在种种问题与挑战,但主流趋势却是持续发展,这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也是两国的努力目标。为使双边经贸关系更上层楼,在新的经济与政治大环境中,中美之间应该建立正常的经贸关系。正常的经贸关系要求:

(1)像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脱钩一样,经济问题应与政治问题脱钩,用政治手段、政治方法去干预经济问题是不足取的,有害的。经济问题的发生、发展和终结有其自身的规律和规则,只有真正做到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脱钩,中美双边经贸关系才能摆脱政治影响而按照客观经济规律正常发展。

(2)经济摩擦与矛盾是任何经贸关系所不可避免的,经济手段与方法应是解决经济摩擦与矛盾的基本方式。

(3)谈判而非威胁更非制裁是解决问题的最主要途径,任何威胁、恫吓、制裁都是强权政治的表现,是冷战思维的表现,不是中美之间正常的经贸关系所需要的。

(4)中美双方均需要用新思维去构筑正常的经贸关系。一个经济上强大的、遵守国际准则的、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的中国不仅可以为美国提供商业机会,更是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支柱之一。当然,中国也需要为进一步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环境与氛围。

中美之间要建立正常的经贸关系,对美方来说当前更应处理好以下问题:

首先,美国应取消“6·4”后所有遗留的对华制裁,包括恢复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向美国公司在华投

资提供担保,恢复中美合作对中国中小企业的改造项目,恢复美国进出口银行对华出口贷款,恢复两用技术产品的对华出口等。

其次,美国对华经济政策应以双赢为出发点。中国经济崛起是一个难以阻挡的事实,试图用政策手段阻遏、延缓其发展既是不现实的,也是不明智的。克林顿政府 1997 年曾提出对华经贸三项战略目标:一是帮助中国加入全球经济体系;二是维持香港作为金融中心和中国在亚太地区作为经济发展引擎的地位;三是支持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加健全的法制。第一项目标业已实现,中美经贸关系自那时以来有了长足发展。布什政府应抛弃“ABC 思维”,继续其后两项战略目标。

第三,美国应协助中国平稳度过“入世”的过渡期,在中国履行“入世”协议过程中提供技术支持、培训和指导,而非片面指责;用经济手段尤其是谈判方式解决两国经贸矛盾与摩擦,而不是动辄挥制裁大棒,滥用“301”条款与反倾销条款;尤其重要的是,经济问题政治化是不可取的,将国家安全之类作为考量经贸关系的指标是有害的。

中美经贸以及双边关系需要多种形式与力量的推动,官方与民间,个人与团体,共同利益与相似目标。虽然良好的经贸关系不能自动转化为良好的政治关系,但良好的政治关系却能推动经贸关系的发展。所以,中美政治、经贸关系的良性互动是双方的努力目标。□

(责任编辑:孟学聪)

参考文献:

- 1.《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2002), 中国统计出版社。
2.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Statistics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2002.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关于中美贸易平衡问题》,《新华月报》1997 年第 5 期。
4. Nicholas R. Lardy: China in the World Econom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ashington, D. C., 1994.
5. Nicholas R. Lardy: Integrating China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2.